

论

● 全国中青年财政经济理论
文选之一

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 编

财政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编者的话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了有助于争取改革的胜利，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体制，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选编了这本名为《论改革》的文集，现作为全国中青年财政经济理论文选之一出版，今后还将陆续选编出版，希望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选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2年1月

目 录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必须克服思想混乱,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代序) 许 毅(1)

调整经济结构 克服深层矛盾

调整结构、深化改革、启动市场 高 坚(15)

结构失衡与调整对策 苏 明(26)

当前财政经济运行矛盾剖析 牛二红(36)

克服财政困难的几点认识 袁振宇(46)

经济环境分析与产业政策研究 鲁 昕(56)

1 : 2.5 的农、工消费对比系数是制定经济

发展规划的重要参数依据 丛安妮 刘保军(64)

消费基金的膨胀及其财政对策 洪 流(73)

论补偿不足 张如石 于传斗(82)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

——论两个基础 钟 良(90)

深化体制改革 强化财政职能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与选择 荀大志(108)

论我国现行财政运行机制的扭曲及其矫治 齐宇印(108)

关于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 刘国良(132)

价格补贴制度改革探索 冯立新 高云正(144)

改革中的财政政策探讨	孟晓宁 卢 姝(150)
深化财政改革 强化财政宏观调控功能	吴俊培(161)
强化财政的调控作用	杨国玉 雷 洪(173)
既得利益: 财政改革中的难点剖析	张良庆(183)
云南财政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杜悦妹(191)
当前地方财政面临的形势及对策	
——对过几年紧日子的思考	郭永萍(199)

理顺企业机制 提高经济效益

做“蛋糕”与切“蛋糕”	王世定(208)
企业机制的转换与完善	于中一(214)
税利分流——深化改革的合理选择	马国贤(226)
论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	郭代模(235)
承包制的偏差分析及完善对策	孙 钢(246)
企业预算外资金探究	沈 磊(261)
探春理财论——《红楼梦》财经	
思想探要	秦凤翔 顾笑寒(272)

建立分税体制 完善分级财政

分税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贾 康(280)
各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比较研究	张扣娣(291)
分级财政宏观调控机制研究	顾性来 周少云(301)
发展县级经济, 提高财政补贴县自给能力	夏清成(312)
按结构财源构想推进地区财源建设	陈水文(318)
预算管理体制建立原则的比较分析及	
改革设想	张复英 李松森(326)

优化调控手段 合理运用杠杆

财政金融协调制衡与基础货币吞吐	杨照南(334)
关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	许善达 潘 静(346)
产品税—增值税比较研究——兼论我国 流转税改革方向	丛树海 夏锦良(355)
发展财政信用的基本思路	晋 轶 梅书森(368)
论投资启动市场问题	文 明(382)
财政补贴的现状、原因及治理对策的 若干思考	卫 琰(391)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必须克服思想混乱，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代序）

许 毅

国民经济的困境与理论上的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了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了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1979—1983年期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地增长，市场购销两旺，财政收入有较大提高。在1979年和1980年间，因改善人民生活、调整价格的影响，产生了财政赤字。后经过全党的努力，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取得根本性的好转。大家公认，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一些同志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了。在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尤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没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抬了头，进而出现了理论上的混乱。特别是有一些同志混淆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的性质，崇拜自发机制，反对计划经济，出现了金钱拜物教意识。有些同志，误解了列宁关于有商品交换的地方就有市场的论断，把凡是需要通过市场交换商品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当作“市场经

济”，以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从而导致用资本增殖机制替代社会主义经济责任机制的错误倾向不断发生。事实上，有市场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这种在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夺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形态，虽然仍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表现形式，但是本质上是完全与商品经济一般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相对立的。在那里，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使资本增殖，因而资本对劳动力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它所依据的是剩余价值规律；而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则是依据平均利润率规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条件下，其依据的是超额利润规律和弱肉强食的规律。而我们党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要重视发展商品经济的方针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因为，商品经济在形式上是运用等价产品相交换的机制，来促进生产社会化，因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本质上则是生产社会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比例越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我们社会主义所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就是指发展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所以，我们要遵循的只能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称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即等量劳动交换等量产品的等价交换规律和市场供求规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

弄错了社会经济性质，就必然导致否定计划经济的错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部门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要把社会劳动必要的比例量分配使用在不同类型的商品上。我们知道，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否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所以，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的

实现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必须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这种自觉的计划性就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自身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科学论断的依据。之所以说是“有计划”，也就是认识到越是生产社会化，就越是需要加强计划性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是针对摆脱资本桎梏，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说的。计划性就是指自觉遵循经济规律的预见性，以及自觉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动性。当然，这里存在着人的主观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矛盾。因此，我们说的计划性，就是要受能见度和能控度的制约。而尤其是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的复杂条件下，这种能见度和能控度是会受到限制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革计划工作和计划管理体制、逐渐完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改革计划工作和体制，是为了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大系统，不太容易把握，加上过去在计划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失误，计划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一些缺点，就认为人们对于客观经济的认识是很难的，对于要自觉依据和运用经济规律也认为是做不到的。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否定计划、否定综合平衡的错误倾向。这样，在批判“主观唯意志论”的同时，就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否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否定人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可驾驭性；崇拜自发，崇拜市场，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天生的以增殖为根本属性的内生机制（这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是已经消失了的），从而把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市场（凡有商品交换的地方都是市场）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属性的市场经济混淆了。于是一时间把“市场经济取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经济”就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这就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于是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具有特定社会主义内容的范畴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了；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已经消失掉的资本、资本增殖等经济范畴又与货币、资金（货币不等于资本）等同了。这种理论认识上的迷误，就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在改革开放方针的实际执行中，就扭曲了原来的正确指导思想，并被有意识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利用。这是这几年中发生思想混乱的原因，也是经济秩序紊乱的原因。这种思想上的滑坡必然带来经济的滑坡。

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各方面都有反映。比如在理论上，用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即土地、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理论）来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混淆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论”（即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又如在金融领域内出现了一种错误导向，即把原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手中主管流通领域的职能机构的银行，变成了经营货币商品的企业。把货币变成经营对象，实际上把货币资本化了。作为资本化的货币，就必然要求增殖，银行的经营管理就必然以赢利为唯一的目标。这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就是在这种“货币资本化”、“银行企业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各地纷纷提出发展和发育“资金市场”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专业银行的分工被打乱了。工商银行下了乡，农业银行进了城，中国银行上了岸，建设银行多功能。但是，资本增殖机制对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和职工都是不起制约作用的。所以，这种做法的结果，不仅没有产生有些同志所预期的以资本增殖为内容的“硬约束”机制，反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同社会主义的经济责任制脱了钩。既无责任、又无风险，于是就发生计划不要了，产业政策不要了，技术政策不要了的自由化

现象。于是银行的贷款规模在迅速地增长。这种用信用膨胀的办法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积累和消费的“双膨胀”，从而导致财政和银行的“双赤字”，其结果就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结构失衡，再生产发生阻滞，经济效益下降。

造成信用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资金市场来调动所谓的“游资”，这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为资本剥削了雇佣劳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相对不足，从而导致资本家慑于投资的风险减少或放慢投资，于是就有游资存在。因此，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本身发生了不平衡。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切资金都存于银行，并且在国民经济统一分配计划指导下，已经通过信用形式作了安排和使用，资金所对应的物资都作了安排。因此，没有物资剩余的形成，也就不可能产生“游资”。积压产品不是剩余物资，而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积压总是与不足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下，不顾物资与资金的总体平衡关系，盲目地在固定资产领域里“调动游资”，款放出去后买不到东西自然还会再存进来，存进来银行可以再放出去。这种在投资领域中由贷款——存款——再贷款过程所产生的投入性的派生性存款，是与流动资金领域中的周转性的派生性存款在性质上不同的。在流动资金领域内，只要不发生挪用，总是有物资相对应，在这种物资与资金的周转中即便发生一万倍的派生也是不会影响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总量平衡的。但是，如果用作固定资产投资，就会产生“一女二嫁”的问题。投资性存贷活动中的派生性存款，如果不加以控制，必然引发信用膨胀。资金必须代表物资，没有物资与之对应的货币正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原因。信用膨胀，货币必然膨胀，而货币膨胀又是随着投资膨胀而来的。有人认为这种资

金市场是把资金搞活了，认为这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是帮了倒忙，它只能是既破坏了总量平衡，又破坏了比例协调。当前的生产滑坡、市场疲软、效益下降，都是与此有关的。

投资规模失控必然造成投资结构的失衡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合比例。曾经有人在批评重工业比重过大时，错误地批评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个客观规律，而主张“消费资料的优先增长”才是经济规律。我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作为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不容置疑的。至于过去对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投资过于忽视，确实应该加以纠正。但是主张“消费资料优先增长”则是错误的。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并且引起了决策上的失误。这突出地表现在计划和投资工作中，既不讲有计划按比例了，也不讲综合平衡了，结果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

治理整顿初见成效 市场开始趋于正常

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生产滑坡、市场疲软和经济效益下降。生产滑坡是事实。但是，市场是不是真正发生了“疲软”呢？市场销售中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些问题现在引起许多的争论。

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好的。首先好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了控制。年度的投资总规模已经从1988年的4500亿元下降到1989年的4000亿元，下来了500亿元。这主要是实行了财政金融的“双紧政策”，在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控制的同时，通货膨胀也相应地得到控制的缘故。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比我们预期的效果要好得多。1990年1~5月份的物价水平只增长3.9%，也就是说一下子压缩24个百分点。我认为，这是治理整顿见到成效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我认为，在这次治理整顿中，群众生活是继续得到改善的。

1990年1~5月份，在有些企业停产和半停产的情况下，职工工资总额上升9%，农民的收入增长3%。1990年1~5月份的储蓄存款增加879亿元，6月份超过1000亿元，比1989年同期的增长额高出近一倍。

判断市场状况的好坏，主要应该分析属于普通居民消费水平内的商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吃、穿、用是最基本的。因此，我们首先就从占整个消费支出50%以上的食品来看。根据1990年1~5月份的统计，在副食品中，肉、禽、蛋的销售增长6~16%。再说穿的，据我调查，基本上是购销两旺。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造成部分消费品销售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这使我国的出口商品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而使得在国内销路本来就不大的高档呢绒、西服、皮鞋等等，都出现了特殊的销售困难。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供大于求、地区产业“同构化”的问题。但这绝不是说人民没有购买力。再例如，电冰箱每百户居民的拥有量1989年年底已经达到36.47台，1990年一季度增长24.5%，即增加了9台；彩电每百户拥有量为51.47台，1990年第一季度增长15.4%；照相机每百户拥有量是17.27台，1990年第一季度增长13.8%。要知道，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替换周期是很长的，而正常需求的增长率却仍然这么高，说明有效需求是不低的。值得认真分析的是，投资品的销售额在下降。主要的问题在于自筹资金和社会集资投资部分在下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据我的调查，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证明了，用信用膨胀的方法，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发股票、发债券来集资，已经不灵了。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并不存在资本家攥在手中投不出去的“游资”。其次，是属于自有资金投资的单位，由于银行停止办理托收承付结算业务，向生产企业订货时，必须先付出一笔预付订金（即现款交

易)，因此，用自有资金投资的单位就要先拿出一笔钱，才能定货、取货。这样就使这些项目的开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就迫使建设单位推迟订货。这是 1990 年第一季度投资品销售不畅的主要原因。

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调整的方式

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生产力资源配置的调整。这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产业结构发生问题的原因是，在大好形势下，一些同志主张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把计划经济丢了，把公有制为主体丢了，这样就会变成资本增殖机制自发调节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了。“经济结构多元化”、“企业本位论”、“投资主体多元论”都是在这种观点下产生的。所以在 1984 年以后，改革开放成为某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借口，以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发育市场，企业承包责任制被扭曲为“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行发展”的、同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相对立的新“三自一包”制。这就是“企业本位论”的具体体现。在价格体制改革中，把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按合理比价的原则，以调放结合方式进行改革的方针，扭曲为“自由交换、自行定价、自发调节和双轨定价”的“三自两轨制”。国家银行的社会主义信用制度被扭曲为“经营货币的企业”，社会主义资金成了能够自行增殖的资本，利息成了资本的价格。这样银行发放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变成了资本主义式的金融资本控制产业资本的手段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又变成了不要企业承担经济责任的“税前还贷”了。这些都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失控和产业结构失调。在这双重失控下，造成了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重复引进、重复浪费的现象。各地区甚至各行业都搞“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成体系。这就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同构

化”造成技术结构提高不了，质量、品种规格不但上不去，相反日益下降的结果。

调整产业结构的根本问题是要强调有计划和按比例；要强调综合平衡，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自由化，充分地发挥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的作用，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在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已经有多年的准备了）真正地建立起来，运用起来。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不能只讲什么“倾斜政策”。因为倾斜、重点都是有局限的。既有时间限制，也有地域限制。只有真正地把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行业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政策，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把生产力配置和资源配置统一起来执行，才能真正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要弄清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运用和驾驭价值规律以符合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主的经济规律体系制约下的计划经济。

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意见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国民经济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这也毋庸讳言。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实事求是，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检查出现的新问题，分析在经济运行的导向上出现了哪些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整体利益的地方和环节。我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改造的。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都是缘于对经济体制中处理利益分配关系的环节设置不当造成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一) 粮食经营承包制方面

现在，在粮食经营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不符合粮食产品特殊性质要求的错误机制导向。(1) 忽视了我国的国情，把粮食的经营也作为一般的企业经营权而下放了，这就出现了统一的市场与分散的经营之间的矛盾；(2) 忽视了我国粮食购销价是倒挂的这一现实，多购、多销、多调的地区就要多亏，而一级对一级的承包基数则是固定的。承包之后再多购、多调，就要受到利益刚性的抵制；(3) 忽视了粮食经营要受农业种植周期限制的特点，一般要一年周转一次，战略储备是推陈储新的过程。所以，过去粮食储备工作都是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任务，银行贷给的储备资金都是低利的。一般都是年息在 2.1~3.3% 左右的利率。而自 1984 年以后，银行强调了利率杠杆的作用，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银行把贷款的利率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没有考虑粮食经营不可能加速周转的特点，不分彼此地要求一律实行高利率，这样就束缚了粮食部门经营粮食的积极性，限制了收购的积极性。其他的农作物也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三种因素都是造成卖粮难、卖猪难、卖棉难矛盾的根本原因。

改进之法只有实行统购统销，统一核算。即各省市只承包他们各自的销售量的部分；凡是外调的和储备部分，都由中央部门统一核算；银行利息一律改按优惠利率政策，恢复原利率 3.3%。

(二) 外贸经营管理体制

开展国际贸易要有灵敏的信息和稳定的口岸与推销渠道，更要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这些都要求必须有统一的政策和口岸的分工。过去集中统一的外贸经营体制，存在着工、贸脱节的矛盾以及亏损全部归中央的缺点。但是，自下放到各省、市承包之后，由于实行了配额下放，外汇分成，亏损自理，因而存在着管

经营的不管亏损、管亏损的不管外汇现象。经济运行机制被分裂，缺乏内在的制约力。既冲击了原有的国际贸易渠道，也影响了各口岸根据国际市场的容量，有组织地计划供货，并出现了水货冲击国际市场的现象，导致货价大跌。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深化改革的方针，应该是统放结合。即出口贸易按口岸统一领导，统一对外报价；口岸同外商洽谈时，应吸收各地区、各厂家一起参加；外汇分成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确定不同的比例；引进外资的企业为了归还外资，应予以优先照顾，不搞“一刀切”；亏损部分按外汇比例分担；也可以代理制，亏损由委托部门承担；进口一律改行代理制度。

（三）银行信贷体制

社会主义的银行应该是国家主管流通领域的经济杠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是我们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结算中心、现金管理中心和货币发行中心。现在，中心的作用没有了，资金的体外循环，机构重复泛滥。除银行外，还有各种信托公司，各地区也有各种财务公司，取消了银行作为全国统一结算中心的职能，各地分支行处只敢轧进，不敢轧出，产生了“存不进、取不出、汇不走”的现象，造成了大量的“三角债”。银行“企业化”和经营货币的“资本化”，这两化再加上层层包干到户，把大生产、大流通、统一结算的流通体系变为不流通的“庄园经济”了。各地多余的资金不能调动，钱到地头死。“三角债”清理不了，主要是因为资本增殖机制在起作用。根本的问题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在理论上错误地把货币作为资本，把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变成了经营货币的企业。由于理论上的迷误，造成了政策上的失误，以至于使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的杠杆，变成了金融资本为资本自身的增殖而剥夺生产企业利润的手段，

破坏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运行秩序，造成流通阻滞、再生产停顿，也扼杀了生产企业的积极性；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失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调，成为制造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人为因素。

对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应当将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国家专业银行的国家银行职能加以恢复。恢复结算中心、现金管理中心和货币发行三大功能；取消存贷包干体制，真正恢复和实行托收承付结算制度，形成国民经济统一的结算中心；各专业银行原则上都应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确定各自的经营范围。

（四）价格双轨制

在过去的生产资料分配工作中，由于过于集中地采取了计划分配方式，同时计划分配又不管集体所有制企业和计划外的市场交易，这是错误的。但是，现在一放到底，计划内的指标越来越少，也是非常危险的。1989年，全国生产资料总产值共计1.1万亿元，纳入中央物资部门专营范围的只有2100亿元（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是定量不定价的）。我们自己的物资部门也引进了市场自发机制，自由竞争，从而使社会主义统一的物资市场被肢解。现行的生产资料价格是统配产品由国家定价（也即是平价），而自销产品是市场议价的“双轨价格体制”。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就出现了一物多价、同质不同价的现象，使产品比价体系出现了混乱。

根本的纠正方法在于恢复商业、物资、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导，坚持一物一价，取消“双轨体制”。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大宗产品，主要是那“两白两黑”，坚决实行国家专管；可以放开的，放开实行市场价格，但要制定市场管理制度，建立市场秩序，实行公平竞争。

（五）企业财务体制